

一得之愚集

陌生的名字 不陌生的故事

彭瑞金

「朝鮮的抗日文學」

韓・宋敏鎬著，鍾肇政譯

六十八年三月文華出版社印行

「朝鮮的抗日文學」是現任高麗大學國文系教授宋敏鎬記述日據下的朝鮮作家詩人們，以不屈的精神、以熱淚、以鮮血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殖民統治的劫難史。根據歷史記錄，朝鮮民族是我們的兄弟之邦，在近代史上，尤其是和日本人的相對關係中，和我們臺灣的命運更是特別相似。但是誠如本書譯者鍾肇政所言，對於這麼一個和我們關係密切的友邦的瞭解，「幾乎到了令人抱憾的地步」。這一部朝鮮人的抗日文學史，除了積極地讓我們多知道朝

鮮人在暴政下艱難奮鬥的一頁史實之外，我想更重要的是提供我們一個自勵和檢省的機會。當我們讀着一羣陌生的名字的時候是不是會讓我們想起，原來這並不是陌生的故事，在淪日五十年中，我們的文學先驅們是不是也走過相等艱辛的步伐？

一點兒都不錯，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朝鮮民族從一九一〇年八月淪為日本人的殖民地開始，整整過了三十六年高壓統治下的黑暗悲慘生活，再粗心的人也可以想像得到，這之間一定有一連串的可歌可泣的流血抗暴運動發生，正和臺灣淪日五十年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抗日運動的情形相同，有慘烈的犧牲、有屢仆屢起的反擊，但是結果也一定會在小大懸殊的情況下被入侵者以對待異姓民族才有的殘酷手段挫敗。但這樣的挫敗不是永遠的，文人詩人尤其有這樣的信心。因此我們讀歷史的時候便常常會發現這麼有趣的爭執，強大的入侵者往往不以軍力佔領的大片土地為滿足，反而念念不忘拿筆桿的弱小文人的那顆心。在這個方面，好像古往今來的侵略者都有着共同的默契，但也這麼巧妙地，從古以來的文人的心也有良好的堅毅回應他們。

這好像已經告訴我們，文化或是應該直說是更富於隱蔽方便的文學，經常成為民族生命的最後據點。我們從雙方拉鋸性的爭執中，或許才能恍然悟出文學可能顯示的真正力量。在平和的時代，文學或是文學家，在整個社會的環扣中，常常被誤認作消極、可有可無的角色，但是在國家民族的絕續存亡關頭，文學家堅持的節操，或許正就挽救了一個國家覆亡的劫難。這本「朝鮮的抗日文學」就是站在這個觀點上，敘述日據時期的朝鮮知識份子們如何在帝國主義猖獗的時期，對抗帝國主義以消滅殖民地人民文化做為長遠佔領的惡毒用心。

日本人佔領朝鮮後，在文化政策方面正是採用世界各帝國主義同時期在全世界所犯的相同罪行，透過檢查制度進行言論彈壓，剝奪言論、出版的自由，巧立許多名目達到控制言論

的地步，目的當然就是封鎖被壓迫者的舌喉，進而消滅被壓迫者的民族意識。但是文學家們絕對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據點。正面的，他們面對警告、禁售、罰鍰、禁止發行、查扣、沒收的迫害手段時，他們勇敢地據理力爭或迂迴轉戰的苦心和毅力，實在不亞於執戟荷戈的武士那麼令人敬佩。當我們看到「開闢」雜誌「雖前後受到三十二次行政處分，依然不改態度，更於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八月號上刊登『在海外人們的回憶』特輯，雖經停刊處分，但期滿後立即又復刊……」的一段記載時，我們可以確信這實在不是文人的固執而已，他們所以選擇走這麼荊棘的道路，實在是爲了維護民族思想的一絲血脈。

間接地對抗方面，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作家們幾乎是挖空心思，透過他們的詩、他們的歌，他們所有的聲音和文字，傳佈他們國土被兼并的憂憤，傳達他們激越的民族情感，表達他們永不屈服的抗議精神。我們可以從這本作品中看到他們不管用什麼形式、什麼姿態，從頭到尾抵抗的火燄都沒有熄過。隨着時間的轉變，帝國統治者迫害的手法會有不斷的修正，但是基本的以消滅文化爲消滅一個國家的基本程式是不變的。當我們看到一代代「一心想活得像個朝鮮人的作家」出來對抗帝國統治者，不懼牢獄、不惜生命的抵抗時，令人深深感應了他們爲文化滅亡、民族意識喪失的恐懼，他們堅持朝鮮的語言，透過文學、透過戲劇盡可能地顯示屬於朝鮮的一點真實，實在不是爲了戀舊懷柔，誠如劇作家李致真自己說的：「當時彈壓甚爲苛酷，將解剖刀深深探入我們的現實生活已屬不可能。故此，做爲一個作家，……，這實在是遺憾的事，也是一件屈辱的事。」撇開作者對自己的自責，我們可以完全瞭解文學透過纖小的筆維護民族意識和抵抗暴力侵略所盡的苦心和艱難了。

透過這一本三百頁的朝鮮抗日文學史，固然展示了朝鮮民族在日據三十六年爲中心的文人抗日史實，但事實上，這本書的意義還可以提供我們兩點感觸。第一，一八九四年的甲午

事件使得臺灣和朝鮮先後落入日本帝國殖民地的命運，在為時幾至相等、歷程幾乎相仿的掙扎過程中，我們也有一代接一代相等可敬的文學鬥士為保存我們的文化命脈、民族血流，做過毫不遜色於朝鮮人的努力。我們慚愧地才剛剛起步，把這些作品從舊書舖塵封的閣樓中找出來，類似的研究根本不要談了。我們從宋氏這本書中所引藉的資料說明，我們更發現這類研究著作相當可觀，不但是個別作者的研究、或專題、或史的研究，光看目錄就夠我們汗顏。我衷心希望這一本「朝鮮的抗日文學」能帶給我們重大的衝擊，加緊腳步。

其次，這本書的原名雖是「日帝下的韓國抵抗文學」，而且作者的原序中也特別標示「本書是以日據三十六年間的文學為中心來討論」的，但是如果我們細心一點便可以看出這個作品的背景實際上是這個世紀以來典型的弱小民族尋求現代化和民族獨立雙重辛苦的縮影。這類國家共同的難題，外面有帝國主義的壓力、迫害、阻撓；對內又得面對封建勢力和愚昧、迷信、守舊的多重困擾，所以「抵抗」二字的意義並不完全像中譯詮釋的「抗日」二字那麼單純，它應該廣泛地包括了朝鮮知識份子透過文學尋求民族成長、國家獨立的全部心聲吐露。如果我們站在這個意義上來看日據下的朝鮮抵抗文學的兩大主題——反封建、反帝制，正就是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共同主題。如果我們不忘記太平洋戰爭時一本世界弱小民族小說選的作品中，同時選了臺灣和朝鮮的作家，我們可以肯定朝鮮抵抗文學的內容，應該有比抗日更寬大的解釋，它應該是從文學來反映的世界弱小民族奮鬥記錄。所以除了文學的意義之外，我們似乎還可以從這樣一部以文學工作者活動為骨幹的作品中找到所謂弱小民族從為反叛而抵抗到強烈的尋求新生的憧憬，實際上就是結合了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共同心願。縱使他們的憧憬不一，包括被譯者為某種理由略去的一節在內，他們即使在悲哀的深淵中却絕未失去希望。正如詩人陸史的「曠野」所述：「在這裏 我播下貧瘠的歌之種籽 當再一次 千

古之後 有跨在白馬之上的超人 來到這曠野 暢開喉嚨歌唱」，可見我們不該把這本書只當文學史讀。

心好腸直的批評

楊克明

「五年一覺雙溪夢」，李震洲著，德馨室出版社印行

有人說我們沒有書評制度，其實也沒有那一個國家真正擁有一套完好的書評架構，個人有個人的觀點，他可以自由發表意見，這種批評是被廣泛見容的。

評書有「我執」也不錯，直觀的意見，只要配合言之有物的原則，未嘗不是個常態。每個人受教育、性格、環境、血統等各項變數的影響，沒有一樣事情，有兩個人看法、反應相同，要求他客觀既是不可能（可以儘可能），直觀的意志判斷就被允許，因之，讀者也有自己的意志判斷，去選擇書評，並進一步去吸收它、消化它。

李震洲寫「五年一覺雙溪夢」，是年輕人致於批評的一個見證。乍看書名，還以為是風花雪月之類的唯美散文，事實上與葉洪生「二十年一覺飄花夢」一樣，表現出關愛社會的熱情，有很多人以為年輕代表無知，認為年輕人不懂得（沒資格）批評，那他應該好好看這本書。

批評是每個人都有的權利，批評之道，我以為第一要抓住問題的重心，第二要提出建議